評介「共產世界去來」

江振昌

書　名：共產世界去來
作　者：高希均
出 版 者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出版日期：民國六九年九月

一、

按照當年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理想，共產主義社會應當是平等的、快樂的、富裕的。但從近百年來的實踐中，吾人發現：它只是一個冷冰冰、矛盾的社會。正如蘇俄著名的不滿分子沙卡洛夫（Alexander Sakharov）於一九七三年九月，接受瑞典廣播記者史登賀（Olle Stenholm）的訪問時所言，「大體上，我是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。因我從未發現，社會主義理論帶有任何新的東西，或帶來更好的社會秩序，（中略）我們和資本世界有著同樣的問題：犯罪、疏離。所不同的是，我們生活在一個極端的社會，極端的缺乏自由、極端的意識僵化，而且最奇特的是，『最好的社會』竟然是極端的矯揉做作。這些現象都是不該有的。」當我們瀏覽完「共產世界去來」一書後，不難對所謂的「社會主義國家」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。

「共產世界去來」一書，是作者高希均博士於今年三、四月間應邀到蘇俄、波蘭及匈牙利訪問五週結束後所寫。他以經濟學的專業訓練爲經，以豐富的常識爲緯，來剖析三個國家的政治制度、社會問題和人民的生活寫實。該書大致分四大部分，除序言中介紹十五則令人發噱的鐵幕笑話外，在「蘇俄紀行」的五篇文章中，他把蘇俄的外强（軍力）中乾（民主）、共黨官僚特權橫行、黑市買賣，及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均作深刻描述。在「東歐觀察」的三篇短文內，作者

對波、匈二國的附庸處境及經濟貿易的概況作一番報導，同時也懇勸國人對東歐貿易勿抱太大奢望，而要採循序漸進方式來溝通雙方歧見。末在「旅途札記」與「蘇聯日記」中，他又以小品、短文等來描述其遊歷旅程之生活片段，並道出他的感慨與結語。

綜觀高希均先生對共產世界的描述，或因囿於共黨國家的刻意宣傳，人民不敢輕吐眞言；或因遊歷時間侷限，致使其所見所聞敷於表面，未能深入基層，致使爲文略有所偏，無法成爲一學術著作。但吾人若從另一角度來看，該書以遊記方式記錄所見所聞，特別是作者的精細觀察與博學多聞，使其文章字句生動、語氣活潑，再加上無數令人深省的小故事，適足以啓發吾人之智慧，使該書更加具有可讀性。尤以我國目前正加强推展對東歐的直接貿易，作者乃國際著名的經濟學者，其主張與建議均可作爲爾後吾人對外貿易的重要參考。

二、

實行共產主義必然導致官僚特權盛行。因就政治學看，權力令人腐化乃不爭的事實，而絕對的權力又造成絕對的腐化。共產黨人在草創時期具有的爲革命而犧牲一切的精神，到奪權成功後早拋得一乾二淨，他們只想如何運用且保持既得權力。於是，權力的絕對獨佔性必然會加速官僚的腐化，使他們逐漸形成一脫離羣衆的領導官僚。蘇俄當前的政治、社會結構即是如此。這個「新階級」享有無數的特權，如最好的食物、特殊商店的配給、特別設置的醫療中心、轎車、公寓、別墅和國外旅行等，其享受的特權愈多，人民受剝削的程度嚴愈重，致使在官僚體制下，人民成爲「特權」的犧牲品。

特別是在一個無所不管的共產社會中，法令多如牛毛，主管多如過江之鯽，特權階級也就隨之產生。由於官僚們在維護特權的自私心理下，只曉墨守成規、因循苟且，當然殊少效率可言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，「因爲政府擁有一切、控制一切，蘇俄各級政府的公務人員及各項規定，變成了全世界最龐大的官僚政治。官僚政治的特色是：自私心、權力慾和低效率。三者互爲表裏，變成了共產政權的三個毒瘤。」他們養尊處優、懶惰成習，不關心人民疾苦；遇事推諉，辦事效率低，有官僚衙門之風；好排場，憑長官意志

，搞瞎指揮；對持不同意見者予打擊報復，眞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。

在實踐上，共產黨創造了「新階級」，而此階級反過頭來維護共產黨。恰如某些西方學者的發現，正因有這個特權階級的存在，它提供成員以物質的享受與精神的鼓舞，故年年欲擠入共黨窄門的大有人在，此乃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作法，但此種官官相護、輪廻倒轉的作法，却是積弊成習而尾大不掉。

三、

實施集體經濟的共產國家，因視勞力爲最重要的生產要素，故而對於各企業的工作條件或工資利潤關係，就不被統治階級所關心，他們對工資及勞工條件的決定，是依照一個抽象的努力觀點，或依照各別資格，而未顧及各企業或工業部門實際的生產成果。在此種「同工同酬，有幹沒幹都拿錢」的無誘因經濟制度下，必然導致實際生產者對工作缺乏興趣，且必然降低產品品質，與降低生產效率及技術之進步。

在共產國家中，由於貧富懸殊與黑市流行，故盜竊與濫耗公款是不可避免的。驅使人們盜竊國家財產的原因，並不只是由於窮困，而事實上是因這些財務似乎不屬於任何人。當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變成無價值時，自然創造一種有利於盜竊與浪費的氣氛。正如書內的一則笑話，顧客言：「你這些東西眞的不是偷來的？」作黑市生意的人答：「當然不是，我是從我工作地方『拿』來的。」共產國家浪費的還不只是財產，最大的浪費還是那些無形的浪費——人力浪費，千百萬人民在無興趣的情況下，從事遲鈍而無生產力的工作，加上那些被認爲傾向資本主義的一切工作之停止進行，凡此皆屬可計算而不可見的巨大浪費，而此浪費亦從無一個共產政權能够避免。

因此，作者總結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，是「由於價格功能無從發揮，資源更難有效利用；由於實施僵硬的公平，人民缺少工作的意願；由於私人企業的禁止，經濟缺少衝力與競爭。由於黨中央操縱一切，市場的供需無法正確反映；由於偏重國防工業，人民生活的改善遭受犧牲；由於服從基本教條，官僚主義普遍，個人創業精神喪失。」這種一針見血的言論，恰道出共黨經濟眞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。

四、

一個生活在共產制度下的公民，常爲他們良心的痛苦所壓迫，終日惶惶不安，惟恐他違反了什麼禁例。他永遠恐懼，因而他必需處處表示他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敵人，就好像在中世紀時一個人必須時時表現出他對於教會的忠誠一樣。在蘇俄，學校制度以及一切社會的與知識的活動都是促成這種類型行爲的。一個人從生到死都一直在統治的政黨關懷之下——關懷他的意識，也關懷他的良知。新聞記者、意識型態闡發者、僱用的作家、批准的官方觀念，以及無數的物質手段都被動員起來，以「提高社會主義意識」。總之，政府的控制力量是無所不在的。

在特務的嚴密控制下，人民不敢與陌生人交談，即令交談亦不敢多講眞心話，惟恐惹火燒身、遭致麻煩。因而高希均先生在「蘇俄紀行」中，發出了一般遊歷共產國家者的共同感慨：「旅行的最大痛苦還不是在於語言、食物、缺乏現代化設備方面的限制，甚至亦不在於交涉事情時的拖延及處處缺乏效率的遭遇，而是在政府有形與無形的控制下，人民不敢輕易與外來陌生人直接交談。」

共產國家雖千方百計的以特務、監獄、大衆傳播獨佔來隔離人民，避免他們爲西方自由思想的「毒素」所感染，但人們仍有其獨立思考與反抗的意志，正如門德爾斯譚在「一線生機」中所言：「在這個國度裏，所有眞正的詩歌，都是暴行迫害的累積。」歷史將證明，人對於思想自由不可磨滅的願望，是永遠可以在具體形式下浮現出來，也許今天它們存於暗中的消極抵抗，存於人民尚未成形的希望中，但這股勢力已逐漸形成一不可輕侮的力量，蘇俄及東歐各國的不滿分子運動，及中共大陸的民主運動都是最佳的例證

五、

波蘭自一九四四年在史大林武力支持下，宣布新政府誕生以來，歷經多次大罷工運動。一九五六年，由於物質缺乏、生活水準低，波蘭工人在波茲南和史特汀等城市發動罷工，戈慕卡（Wladyrlaw Gomulka）上臺後，允諾給人民更多的「麵包與自由」。一九六八年一月，波人爲紀念詩聖米基羅茨（Adam B. Michiewicz）逝世，在華沙人民劇場演出反俄帝話劇「列祖列宗」，經蘇俄抗議被迫停演，激起學生示威遊行，與軍警發生衝突。一九七〇年耶誕前，格

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工人，因物價上漲而實施罷工，大學生亦示威附合，迫使波共頭目易人，吉瑞克（Edwand Gierek）繼任。一九七六年波政府宣布提高食品價格，引發拉頓（Radom）的流血暴動。再到今年七月，波工人不滿肉價上漲過劇，又聚成一百五十多處的罷工洪流，其餘波動盪，雖以卡尼亞（Stawslaw Kania）上任，仍未能平息。

歷次罷工導火線均源自物價上漲，而政府內則無法提供充分物質，外則負債累累，當然難以滿足人民需要，加上波人抗拒壓迫的民族性，罷工暴動自難避免。就波共頭目的替換頻仍，我們尤易感覺到經濟成敗決定政治生命的例子，在波政府內表現的最突出。誠如作者所言，「在共產政權下，執政者一再承諾既無通貨膨脹，又無貧富不均；既要改善人民生活水準，又要提供社會福利，這實在是人間找不到的烏托邦。當這些諾言一再落空後，執政者就變成了支票無法兌現的犧牲者」。戈慕卡與吉瑞克的下臺應是個最佳註脚。

目前波蘭罷工愈演愈烈，甚至蘇俄以軍事演習作威脅，但問題仍無法澈底解決，究其因在：今日工人的要求已被知識分子所轉化，他們由重視經濟生活轉而要求民主自由，這是波蘭工人運動的進步，亦是波共難解的死結。現時波共答應對經濟讓步，但對某些政治要求則一概拒絕，惟恐它將動搖波共政權的根本，但飽有罷工經驗的工人終於發現，沒有政治自由和改革，經濟困境永無法解決，故他們在「社會自衛委員會」（KOR）的幕後領導下，仍不斷進行有計畫、有組織、有秩序、有步驟的抗議活動，其成效雖在未卜之數，但意義則非常重大。

六、

在東歐的波蘭、捷克、南斯拉夫，甚至東德都有相當程度不滿運動時，只有匈牙利可能是特殊的例外。目前在匈牙利一切都是沉寂的，然而在過去她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高度成熟而民主的抗暴革命，由於蘇俄的强力彈壓而告胎死，這種慘痛深入到人民靈魂深處，使抗暴成爲匈牙利人的禁忌。此外，匈國强人卡達（Janos Kadon）在匈牙利揉合了嚴厲與狡智的統治，亦是使不滿之聲消匿的主因。

卡達對鎮撫人民的最有效作法是他的消費主義，因而他對奢侈、消閒文學、電視娛樂等均大力倡導，其目的在使人民盡量「非政治化」。而在理政上，他對經濟政策與處理農工抗議問題上是從寬的，因之軟化大衆的不滿，此也使得匈牙利成爲東歐經濟最穩定的一國，年有餘糧輸出。比較而言，匈人實際生活較蘇、波爲佳。如作者在布達佩斯所見，「生活必需品及一些高級消費品充斥市面，既無排隊長龍，亦少黑市」，加上匈共當局對大衆交通工具的普及、住宅的改善及綠地的維護，和有較大的自由市場，及尙可的需求管制，故匈國的經濟政策頗有成效。

另外，就當前拓展東歐貿易之可能性，吾人贊同高希均先生的見解，「就短期來看，開放東歐直接貿易是政治意義多於經濟利益，是運用彈性外交的一個範例。就長期來看，貿易能否帶給自身經濟利益，就要看我國政府與民間對東歐市場的瞭解，及國際局勢的演變。」因此，若有人期望在短時間內實現大規模貿易這種想法將是一種錯覺。但我國需依靠國際貿易的，絕不能忽視任何有潛在力的新市場。吾人以爲，雖然在開始時也許貿易額不大，但只要有貿易，經過悉心地發展，這一市場該是很有前途。

目前首要任務，應是在國內設立一正式機構與東歐五國類似的機構建立良好關係，以交換商情、主辦展覽和訪問，解決貿易問題來促進彼此間了解。當貿易展開後，政府當局與工商界必須格外小心維持我國產品的信譽，搏取他們外貿負責人的信任。此外，我們在和共產國家貿易的作法上，須積極排除貿易行政上的障碍，需清晰了解當地市場，加上政府全面支援配合，以耐心和恒心來拓展一個對外貿易的新領域。

七、

彌爾 (John Mill) 嘗言：「把任何人視爲政治上的下等人是不道德的。」人生惟有透過不同的人性活動來向上發展才會有不同的價值；而相當程度的濟經安全與獨立自主，方能提供成就充足人性的機會。富裕、豐足、自由、安全與平等都是我們所追求的，但這些都必須在對人的尊重上才能獲得和達成。拜讀高教授的「共產世界去來」，令吾人發出如斯的感慨，在此我願向讀者鄭重的推薦。